

突发社会危机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的设计

郭海明¹,杨言勇²,王海东¹

(1.兰州商学院 统计学院,兰州 730101;2.甘肃省统计局,兰州 730000)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各种利益主体空前分化、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导致突发社会危机频发。突发社会危机的常态管理已逐渐成为社会安全治理的主导方式。对突发社会危机“苗头性”、“倾向性”信号进行监测性搜集,既应当从被观测者的各种客观“境遇状态”上做数量测度,又必须从被观测者的主观体验上做感知调查,使用客观测量指标和主观感受指标相结合的方式,遵循针对性、全面性、系统性、可行性等基本原则进行相关的指标体系设计。基于观察突发社会危机诱因变动与系统记录突发社会危机各种可能征兆的认识,在厘清统计监测与统计预警评估关系的同时,着重从经济利益、政治权益、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公共安全、民族宗教等六个方面,根据原因导向设计构建了一套指向一般公众、家庭和社区的突发社会危机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关键词:突发社会危机;统计监测;统计评估;指标设计;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3;C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4)03-0018-07

突发社会危机对社会运行秩序、经济社会发展和公众生产生活及其生命财产安全都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全面认识并准确把握突发社会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对具有苗头性、倾向性的相关问题进行统计监测,及时汇总信息,开展科学评估,提前采取各种防控措施,是避免突发社会危机演变发展和造成重大损失的可行途径。我国已经进入突发社会危机高发期,常态管理已成为当前和今后社会安全治理的主导方式^[1],亟需加强对突发社会危机的日常监测和定期评估。本文拟就突发社会危机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的设计进行探讨,以便为监测评估和预防控制突发社会危机的发生演变奠定基础。

一、突发社会危机的含义及其主要成因

在理论研究中,对突发社会危机有不同的称呼,如“公共危机”、“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等等。其内涵界定,也是见仁见智,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马庆国等认为,突发社会危机就

基金项目:甘肃省软科学计划项目(1006ZCRA139)

作者简介:郭海明,硕士,副教授(E-mail:guohm@lzc.edu.cn)

是突然爆发的非常规的事件,具有发生概率低、应对知识措施少、次生灾害严重的特点^[2]。赵剑波等认为,突发社会危机是指在某种必然因素支配下出人意料地发生,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损失或者影响且需要立即处理的负面事件,突然爆发、难以预料、必然原因、严重后果、需紧急处理等是其构成要素^[3]。王旭辉认为,突发社会危机就是利益受损群体在共同意愿支配下的“制度外”集体抗争行为,其中“群体”、“事件”、“行动”和“制度”是四个关键分析要素^[4]。张海波认为,危机既是一种非常状态,也是一系列紧急事件,突发社会危机则是具有社会风险的“事件(点)”演变形成的“过程(线)”,完全可以进行预警、防控^[5]。

综上所述,发生的不确定性、表现的非常态性、后果的破坏性、应对的紧急性是突发社会危机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因此,突发社会危机可以表述为,对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需要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公共部门整合全社会的资源,迅速采取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一种紧急的社会安全状态。这样的内涵界定,意味着那些蓄谋的政治性动乱和恐怖暴力活动以及重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交通事故灾难、技术事故引发的灾害事件等群体事件,不属于本文所定义的突发社会危机的范畴^[6]。

从理论研究和现实经验分析,突发社会危机的主要成因可以概括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利益主体的经济矛盾。市场化的进程中,社会公众更加关注自身及其家庭在生产劳动、财产关系、收入分配、消费支出等方面的利益,经济结构的调整使不同主体间的经济矛盾加剧,尤其是分配不公问题是引起突发社会危机的最常见因素。二是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转型期公众思想观念、精神诉求、思维方式等的多元化和社会结构的演变,都会促使社会分化加快、发展失衡加剧,系统性的社会结构失调致使社会矛盾凸显和激化,极易造成突发社会危机。三是公共治理的体制矛盾。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转型期,已有社会组织形式、法律制度、治理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创新相对迟滞抑或不能配套起来协调推进,政府管理行为失范,制度化诉求渠道阻塞,导致体制性运行矛盾多发,过度积累就会引发社会危机问题。四是管理队伍的贪腐矛盾。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法制建设长期滞后,民主管理不够完善,公共权力监督缺失,公权人员不作为或滥用权力,官僚作风和司法腐败让政府公信力下降,从而加剧了突发社会危机的爆发。五是社会发展的文化矛盾。在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社会化的影响下,自由多元价值观文化快速传播,部分优秀传统文化被遗弃,社会族群和宗教间的文化差异显现,特别是公众民主要求的普遍增强与其法治观念淡薄、责任意识缺乏、诚信品德下降、和谐精神不足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时期突发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

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突发社会危机的基本含义、主要成因及其典型特征,是科学设计突发社会危机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的基础。

二、突发社会危机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

笔者发现,在几乎所有对突发社会危机进行研究的文献中,有意或是无意地把监测与预警评估不加区别地混淆在一起,致使这些研究把目光完全集中在评估指标的设计确定和评估方法的选择应用上,而忽视甚至于根本性地忽略了指标数据的微观采集过程。这样做的典型后果表现就是,所构建的突发社会危机预警评估体系因过于侧重区域宏观性、缺乏微观具体

性,在实践上的操作指导作用小。

监测,是对正在发生事情的同步记录,是一种描述性的活动。预警,是对危险信息的提前告知,是一种评判性质的活动。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既可以利用统计方法从数量角度进行同步描述性的记录,也可以通过统计方法从数量角度做出预告性的风险评判,前者是统计监测,后者则为统计预警评估。从(统计)监测、(统计)预警评估的含义及其实施过程,可知它们之间并非完全等同,而是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所不同。(统计)监测是为了实现监督目的而进行观测(或测算),它重在“测”。(统计)预警评估则是为了达到预警目的而进行评判,它重在“评”。也就是说,(统计)监测和(统计)预警评估的共性在于为了实现既定目的,都需要利用一套确定的指标体系及其数据,其不同在于(统计)监测的核心是获取监督用的有效数据信息,(统计)预警评估的关键是建立预警用的科学评估方法。所以,若不考虑“监督”和“评估”目的上的差别,专注于期望获得的“指标”及其“数据”,就很容易自然地把(统计)监测和(统计)预警评估混同为一回事。

基于上述认识和理解,在研究突发社会危机问题时,笔者认为突发社会危机的统计监测体系和突发社会危机的统计预警评估体系并不相同。突发社会危机的统计监测体系由监测组织体系、监测方法体系和监测指标体系等方面所组成,突发社会危机的统计预警评估体系则应由预警评估指标体系、方法体系和标准体系等组成。前者要解决的是突发社会危机的“监测信息”的有效获取问题,后者要解决的是对突发社会危机的“现实可能性”的评价判断问题。其中,监测指标体系和预警评估指标体系不仅在数据搜集的目的上可能不完全相同,而且在具体指标的设计和其数据的获取方法上也会存在差异。这就是说,笔者认为建立突发社会危机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的目的是对“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的具有“苗头性”、“倾向性”的信息进行监测性搜集,组成其指标体系的各种指标应当指向具体的公众、家庭和社区,使用经济科学的调查手段及时获取数据资料。而建立突发社会危机统计预警评估指标体系的目的则是对突发社会危机“逼近现实”程度的信息进行搜集,组成其指标体系的各种指标应当指向宏观的群体、区域和事项,主要通过汇总整理监测指标数据而得到其有关的指标数据。

所以,设计突发社会危机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时,应当主要从持续观察可能引起突发社会危机的各种因素变动与系统记录突发社会危机发生前各种可能征兆的角度出发,遵循针对性、全面性、系统性、可行性等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在公共危机理论和统计调查理论指导下,结合特定时期的客观实际,筛选并最终确定有关的指标组成。

另外,由于突发社会危机是各种社会风险积累超过社会承受能力之后的爆发,所以,对突发社会危机“苗头性”、“倾向性”信号进行监测性搜集时,就需要既从被观测者的各种客观“境遇状态”上做数量测度,又从被观测者的主观体验上做感知调查。因此,还要考虑使用客观测量指标和主观感受指标相结合的方式构建突发社会危机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三、突发社会危机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及其组成

综前所述,笔者认为可以从经济利益、政治权益、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公共安全、民族宗教等六个方面,分层构建突发社会危机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参考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筛选确定的

监测指标子体系及其有关具体指标构成如下。

(一)经济利益监测指标体系

一般来说,人们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利益,集中表现在其收入分配与消费支出上。收入主要源于劳动就业,而消费不仅取决于获得收入的多少,还受制于税赋的轻重。故而,经济利益监测指标体系设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经济利益监测指标体系

目标层	构成层	监测指标性质	具体监测指标
经济利益	就业状况	客观测量指标	家庭就业率 家庭成员最长失业时间
		主观评价指标	家庭就业满意度
	收入状况	客观测量指标	家庭纯收入年增长率
		主观评价指标	家庭收入满意度
	税费状况	客观测量指标	家庭缴纳税费年增长率
		主观评价指标	家庭税费负担感
	消费状况	客观测量指标	家庭消费支出年增长率
		主观评价指标	家庭物价上涨承受度 家庭消费满意度
	储蓄状况 (或投资状况)	客观测量指标	家庭储蓄(或投资)年增长率
		主观评价指标	家庭储蓄(或投资)满意度

(二)政治权益监测指标体系

公民的政治权益主要包括选举权和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从现实上看,在我国现阶段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公民参与民主管理的权益更为重要。考虑到实践中,民众在单位或社区、村委会等范围行使公民权益的情况更常见、更广泛,也与民众的利益诉求关系更紧密,则政治权益监测指标体系可设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政治利益监测指标体系

目标层	构成层	监测指标性质	具体监测指标
政治权益	知情权 ¹⁷⁾	客观测量指标	参加单位座谈(意见征求)会次数 参加社区(村委会)座谈(意见征求)会次数
		主观评价指标	对公共事务告知情况的满意度
	表达权	客观测量指标	向单位表达诉求被受理的次数 向社区(村委会)表达诉求被受理的次数
		主观评价指标	对单位(或领导)工作的满意度 对政府(或工作人员)工作的满意度
			对公职人员清廉满意度
	选举权	客观测量指标	参加选举的次数 参与竞选(竞聘)的次数
		主观评价指标	对选举透明性的满意度 对竞选(竞聘)公平性的满意度
	决策(参与)权	客观测量指标	参与单位(社区、村委会)投票表决事项的次数 参加行政决策听证会的次数
		主观评价指标	对行政决策的满意度

(三)社会保障监测指标体系

通常,社会保障主要涉及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基本保障¹⁸⁾,考虑到总指标体系中单设了“文化教育监测指标体系”,故这里仅从住房、医疗、养老和社会资助四方面来设计社会保障监测指标体系,具体见表 3 所示。

表 3 社会保障监测指标体系

目标层	构成层	监测指标性质	具体监测指标
社会保障	住房保障	客观测量指标	家庭人均住房面积
		主观评价指标	对现有住房的满意度
	医疗保障	客观测量指标	家庭医疗支出年增长率
			家庭医疗保险年报销率
		主观评价指标	对现有医疗支出的承受度 对现有医疗保险的满意度
	养老保障	客观测量指标	家庭养老保险金年领取额
		主观评价指标	对自身养老的焦虑度
	救助保障	客观测量指标	家庭接受失业资助（或帮扶）的次数 家庭获得的年均低保（救助）金
		主观评价指标	对失业资助（或帮扶）的满意度

(四)文化教育监测指标体系

文化教育对民众的思想情感、生活水平、工作质量和理性思维都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考虑到我国民众对非学历教育需求重视程度比较低的现实,主要从学校教育出发设计文化教育监测指标体系,具体见表 4 所示。

表 4 文化教育监测指标体系

目标层	构成层	监测指标性质	具体监测指标
文化教育	教育消费	客观测量指标	家庭成员人均受教育程度（年限）
			家庭教育费用支出年增长率
		主观评价指标	对子女（入园）升学的满意度
			对学校教育质量（管理）的满意度
	文化消费	客观测量指标	对子女教育支出的承受度
			对教育公平（或政策）的满意度
		客观测量指标	家庭（年度内）参加文化活动的人次数
		主观评价指标	家庭文化消费支出年增长率 对（年度内）流行文化现象的关注度（或知晓率） 家庭文化消费满意度

(五)生存安全监测指标体系

生存安全应当包括生活安全与生产安全两方面,其中生活安全可细分为食品安全、居住安全、交通安全等等不同的具体内容。在对突发社会危机的内涵界定中,已经把重大自然灾害、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重大事故灾难、技术事故引发的灾害事件等排除在外,所以生存安全监测指标体系的构成如下表 5 所示。

(六)民族宗教监测指标体系

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西方敌对势力不断渗透的大环境下,民族宗教问题最容易被利用并引发突发社会危机。在本研究中,设计民族宗教监测指标体系时,不考虑纯粹的政治性动乱因素和恐怖暴力活动,具体指标构成见表 6 所示。

在上述指标体系中,凡是主观评价指标,其评价时的对比标准可以是被观测者的同事、同行或居住区相邻家庭等的相应指标,也可以是被观测者过去或者期望的相应指标,还可以是被观察者所处时期相应指标的社会一般水平。另外,上述指标体系的应用,也应当根据监测的不同组织形式,在不同监测点有所侧重。譬如,实施全面监测时,可以考虑所有监测点都使用全套指标体系进行监测报告;而在进行非全面监测时,可以考虑根据不同监测点的性质侧重

表 5 生存安全监测指标体系

目标层	构成层	监测指标性质	具体监测指标
生存安全	医疗卫生安全	客观测量指标	家庭居住区自来水饮用（普及）率
			家庭遇到的医疗纠纷（或事故）次数
		主观评价指标	家庭买到伪劣药品的次数
			医疗服务满意度
	商品消费安全	客观测量指标	家庭买到假冒伪劣（非食品药品）商品的次数
			家庭买到伪劣食品的次数
		主观评价指标	食品消费安全感
			（非食品药品）商品消费满意度
	社会治安安全	客观测量指标	家庭成员遇到坑蒙拐骗的次数
			家庭成员遇到交通纠纷（事故）的次数
			家庭及成员遇到财物盗（抢）的次数
			家庭及成员遇到人身威胁（伤害）的次数
生产安全	客观测量指标	家庭居住地与最近警点的距离	
		个人（或集体）上访次数	
	主观评价指标	居住安全感	
		出行安全感	
	客观测量指标	家庭成员所在单位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次数	
		主观评价指标	生产工作安全感

表 6 民族宗教监测指标体系

目标层	构成层	监测指标性质	具体监测指标
民族宗教	民族关系 ^①	客观测量指标	家庭族际交往朋友数
			居住地民族混居比例
			居住地有关民族问题的传言次数
		主观评价指标	居住地已知的民族纠纷事件次数
			家庭族际交往频繁程度
			居住地族群偏见程度
	宗教关系	客观测量指标	民族和谐关系满意度
			家庭成员宗教活动参与次数
		主观评价指标	非正式渠道宗教言论数量
			居住地有关的宗教问题传言次数
		居住地已知的宗教纷争事件次数	
		教派（民）偏见程度	
		宗教和谐关系满意度	

选用反映不同方面(原因)的监测指标子体系进行监测报告。

一般而言,指标体系的实际效用如何,不仅仅取决于指标体系的设计是否科学准确,还会受到监测实施的组织形式、数据资料信息的调查方法和获取到的数据资料信息准确性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所以,构建起突发社会危机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远没有解决突发社会危机统计监测的全部问题,还有必要就其监测组织体系、监测方法体系等进行深入研究。考虑到对突发社会危机的预警防控要求,监测指标体系及其数据资料信息与预警评估指标体系及其数据资料信息的协调、衔接、整合也应纳入进一步研究的范围。

参考文献:

[1] 童星,曹海林.2007—2010 年国内风险社会研究述评[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8-13.
 [2] 马庆国,王小毅.非常规突发事件中影响当事人状态的要素分析与数理描述[J].管理工程学报,2009,(3):126-130.

- [3] 赵剑波,刘雯雯.非常规突发事件的传播方式与应急决策[J].改革,2009,(11):155-160.
- [4] 王旭辉.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概念、分析要素与价值立场[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56-60.
- [5] 张海波.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基本问题——概念、框架、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向[J].公共管理高层论坛,2006,(1):76-92.
- [6]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成因及对策[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18.
- [7] 黄鹏.公共应急法制中公民权利保护的理論模式[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82-85.
- [8] 王筱欣,杨臣.社会保障支出与城镇化——基于时间序列的实证分析[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3,(12):49-55.
- [9] 郑双怡,张劲松.民族关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监测预警机制研究[J].民族研究,2009,(1):21-30.

责任编辑:万东升

Design of Statistical Monitoring Indicator System for Unexpected Social Crisis

GUO Haiming¹, YANG Yanyong², WANG Haidong¹

(1. School of Statistics,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Lanzhou 730101, China;

2. Gansu Province Bureau of Statistics,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China's reforms are now heading for the "deep water" section where unprecedented differentiation among various stakeholders and complexity of social conflict lead to unexpected social crisis more frequently than ever. Normalization of Crisis Management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form of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Follow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arget, comprehensiveness, systematicness, feasibility and by monitoring incipient tendency of unexpected social crisis, this study designs an early warning index system of social crisis that combines objective metrics from quantification of the "Situation Status" of the object with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experience of the object. By observing the change in incentives for social crisis and understanding the records of all signs of possible social crisis, the study designs a cause-oriented early warning index system of social crisis that leans toward the public, family and community emergency social crisis. The index system of social crisis focuses on six aspects of economic interests, political interests, social security, culture, education and public safety, while clarifying relations between statistical monitoring and statistical early warning assessment.

Key words: emergency social crisis; statistical monitoring; statistical assessment; indicators design; index system